

王老师回忆文章

忆和二姐相处的日子

王 圩

1 姐弟情深

1.1 平生第一次穿上球鞋

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的 1946 年，父亲失业，全家除大哥（王埏）在北洋大学读书有助学金自理外，家里其他 6 口人的生活都靠大姐（王埏）在北平公用局当打字员的微薄薪水以及我母亲为人洗衣服赚点补贴糊口，生活艰难。月底常常是找“打鼓的”（就是旧社会走街串巷收购估衣旧货的）变卖一些旧东西换点钱接济生活，记得一天我眼睁睁地看着打鼓的把我正在收听孙敬修老师播讲“苦儿努力记”节目的话匣子（即收音机）拎走了。我们孩子穿的鞋常年是靠母亲纳的鞋底子躺的布鞋，由于当时我爱踢皮球，鞋底常被磨穿成圆窟窿还照样穿着，我二姐（王境）的情况也不会比我好到哪儿。细心的大姐也许早就发现了。一天，大姐下班回来兴冲冲地告诉我和二姐，单位年底要发双薪，打算给我和二姐每人买双球鞋，这对全家不啻是一件大事，我们热烈地讨论了许久到底买什么牌子的球鞋，大姐坚持要买最好的，这和大姐平常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阴丹士林蓝色布旗袍工装的朴素打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经过一夜的兴奋辗转，终于等到次日下午放学，二姐和我急着从地安门校场住家步行去地处六部口的北平公用局二楼秘书科，等着大姐下班。还记得大姐工作的打字室有好多年轻的女士们在打字机前忙碌地敲打着“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看得出大家都很高兴兴奋，也许都在憧憬着下班时领到双薪后去圆自己的什么梦吧。终于下班铃响了，大姐把领到的双薪放进一个木质提手的花布手提袋内，领着二姐和我步行去了离公用局不远的西单商场。在商场内几经往返，终于在一个价钱还算公道的店里给二姐挑了一双蓝白相间的高腰“回力”牌球鞋，而我选中的是一双黑白相间的回力鞋。当时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换上干净袜子穿上了新鞋，大姐看透了 we 舍不得让新鞋着地的心理，破例带我们坐环线铛铛车（有轨电车）在厂桥站下车回的家。记得当晚家里是吃白菜帮虾皮馅的玉米面团子。家里没有醋了，我和二姐相伴去西大街打醋。我们走在路上借着皎洁的月光抬腿品评欣赏着我们的新鞋，鞋底海绵的弹性使我们真实地体会了“穿新鞋、高抬脚”的心理和物理的含义，心中的喜悦和姐弟手足之情难于言表。

1.2 难忘的豆腐脑

现在说起豆腐脑可能是再平常不过的北京小吃了，但对小时的我能吃到它却是一件大事。这要从我的邻居、同在西皇城根小学的学伴“小东子”说起，小东子家里比我们条件好，他爸爸常带他出去逛商场、庙会，在外边吃些小吃是家常便饭，他常常说起用芝麻烧饼就着豆腐脑吃是他的最爱。我回家可能无意中提到了这件事，羡慕之情可能有所流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由于我在家里是老幺排行老五（乳名小末），大姐（老大）比我大14岁，二姐排行老四，也比我大8岁，在家里人人都宠着我，关爱有加。带我去吃一次豆腐脑大概是家里人的心愿。1947年春节前的一个周末，家人为了了却这件事，决定由大姐和二姐领我去西四牌楼吃豆腐脑。

那天适逢三九隆冬，虽然太阳高照，但呼啸的寒风还是吹得冷彻入骨。当我们走到西四胜利电影院门外的豆腐脑小吃摊前时，从口罩呼出的热气都已经使我们的眉毛和前额的发梢结上了白霜。豆腐脑的摊主是一位紫脸膛络腮胡子，声若洪钟的爽快汉子。见到我们忙招呼“快来三碗热豆腐脑暖暖和吧。”“我们只要一碗给弟弟”，大姐说着并掏出了一块用手绢包着的“银裹金”烙饼（我母亲用白面裹着黄玉米面烙的饼）说，“请掌柜的把这烙饼烤烤让我弟弟就着豆腐脑吃，谢谢啦！”摊主挑起了浓眉，大声应着“好嘞，请好吧您那！”只见他麻利地用一把长柄浅底的大木勺子从一个锃光瓦亮的紫铜锅内舀出了两大勺细白嫩滑的豆腐脑放入一个敞边的中号白瓷碗里，然后舀入一大勺羊肉口蘑黄花鸡蛋片卤，再用小勺满满的加了两勺用辣椒面炸的红辣椒油，接着撒上一把香菜，红白绿相间的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就摆在我眼前了。摊主手上忙活着，嘴也没闲着，他朝着离开小摊的我的两个姐姐向我努着嘴瓮声瓮气的说“您瞧瞧！多好的两个姐姐，赶明儿你长大了可不要忘了她们哟！”当时无语的我只重重地点头回应着。一碗豆腐脑一刹那就被我风卷残云般地吃下了肚，顿时身上寒气全消。转头望着远处在寒风中伫立着的姐姐们，也许是豆腐脑中过多的辣椒油使我不自主地眼眶迷蒙，但我耳边却一直在回荡着摊主的箴言：“长大了可不要忘了她们哟！”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第一次吃豆腐脑的经历。

2 姐姐对我的启蒙

2.1 在“反饥饿、反内战”请愿书上签名

从日寇投降到北平和平解放，我正值8-11岁的少年时期。其间由于家境贫寒，对姐姐们参加进步青年的活动，如二哥王度（后去解放区改名王在）在四中组办贫穷失学儿童识字班、教这些孩子学文化，大姐参加青年读书会，二姐参加民主青年联盟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步等活动，在朦胧中有一种认同感。我也很愿意让他们带我去参

加一些进步学生的集会。记得有一次我和二姐一起去参加北大沙滩红楼民主广场上的营火晚会，看节目、听演讲。晚会后大家都拥到红楼内一个大房间里，在一个由课桌拼起铺上大字报的请愿书上签名“反饥饿、反内战”，当时我被大家激昂的情绪所感染，也签了名。记得有一位戴眼镜的大哥哥问明我上哪个学校后，还大声宣布欢迎北平小学生代表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列。在大家叫好鼓掌声中，我感觉又兴奋又有点儿不好意思。

2.2 在解放军围困的北平城内散发传单

1948年的冬天，北京城外的隆隆炮声由远及近，市民们都忙着储存粮食和咸菜，为解放军要攻打北平做着准备，我们家亦不例外。但父母暗自喜悦的心情却大于惴惴不安。因为解放军进城会给他们带来我二哥的消息（1948年秋，我二哥因在天津北洋大学参加地下党被国民党通缉而被党组织秘密送往解放区）。一天清早我去上学，发现学校已被国民党大兵征用了，小学校长宣布无限期放假了。看来，战争的确临近了。那些天我发现大姐和二姐也比从前忙起来了。一天晚上，我见到二姐和大姐进里屋把棉门帘放下了，我好奇地闯进去看到她们正在床上分一沓沓的红绿纸。二姐见我进来，就神情凝重地拉住我小声说：“小末，解放军就要打进来了，你要不要也做点事？”“什么事？”“散发传单”我听了异常兴奋，心里突突地说“我愿意！”“那好！你看这红色的传单是解放军发布的《告全市人民书》，要把它放在人们容易看见的地方，人看到的越多越好。这个绿色的是警告那些地方上当保长之类的那群人，叫他们不要搞破坏，这要送到他们家里。”就这样，我也分到一些传单，开始帮二姐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事了。没过几天，只见邻里们拿着传单在窃窃私语，而那些保长之流却龟缩起来，想必他们也在悄悄准备“后事”了。看到此，一种成就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3 “文化大革命”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大革文化命”的提法似乎得到了绝大多数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们认同。但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有一篇社论剖析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提法也是客观的描述。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摧枯拉朽”的政治威压舞台上，人们的百态表现恰恰“酣畅淋漓”地反映了不同人灵魂的真、善、美和伪、恶、丑。我相信，会有历史学家、政论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愿意以一个科研人员求真务实的良知来客观叙述我的一段亲身经历。我二姐王境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广州中山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兼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和全国各地一样，“文化大革命”之初我二姐首当其冲是最先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在国民

党白色恐怖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参加地下党、投身革命的人怎么会蜕变成了阶级敌人？首先，她不可能为了私利不顾掉脑袋的危险，在国民党敌占区“钻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如果不是作为双肩挑的干部在五八年“大跃进”年代以刚刚坐完月子之身（照例可以不下乡）就响应党的号召带头下乡去水田里插秧劳动，也不可能落下了尿失禁和肝损伤的毛病。以我熟知二姐那种疾恶如仇的禀性，我相信在她担任教研室领导期间，不可能在抑恶扬善的工作中不得罪那些心灵不善的人，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表演一番完全符合逻辑。由于这些“造反派”在我二姐身上实在找不出什么能上纲上线的言行，于是就想从家庭社会关系上找突破口。“造反派”们的嗅觉不可谓不灵敏，当探听到我们家和当时已被林彪、江青一伙“揪”出来的所谓“大军阀、大野心家”贺龙有“亲属”关系时，如获至宝，想以此为突破口，把我二姐“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由于贺龙之妻薛明（去延安后改的名，原名王爱真）是我的叔伯堂姐，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贺龙及其妻薛明确实和我家有过几次来往，但那都是光明正大的关系，无可厚非。薛明是我六伯父王锦麟提供资助在天津上学，抗日时期奔赴延安入抗大学习并与贺龙相遇、相爱而结婚。北平解放后贺龙通过六伯父得知我大姐、二姐和二哥都是参加地下工作的，贺龙很想见见这几位党的地下革命青年，于是1949年初在北京同和居饭庄约请我二哥（当时在北京军管会工作）、姐（大姐在公用局协助前北京市委书记贾庭三工作，二姐作为地下党员仍在北京女三中高三上学）吃饭，见了一面。后在50年代我哥姐在去看望来北京的六伯时遇到了薛明，闲聊中听说我正在北大物理系学习时，薛明有意让我去她家给其子贺小龙辅导功课，我哥姐当时未置可否，也许他们深知我和他们一样，都有那么点不愿“高攀”的脾气吧，跟我说也只会碰钉子。这就是我们家和贺家淡如水的来往情况。我二姐那儿的造反派想找我母亲下手，派人千里迢迢到北京来套我母亲对此关系的“口供”。记得1970年初冬的一天，母亲患感冒病卧在床，我正好在家照料。突然我家所在的百万庄小区街道办事处某人未经敲门就径直带领一个戴着眼镜举止猥琐的瘦个儿男子（不知其名，权且尊称“眼镜”）从厨房阳台的后门闯入了我母亲病卧的大房间，二话没说、直奔主题：“杨晓云（我母亲名），有外调！了解你家和贺龙的黑关系！”当时我一把无名火起，从正在给母亲配药的小房间跑过去：“你们要干什么？！连门都不敲！我们是专政对象吗？没看见我妈正病着吗？我在一二九部队（当时科学院新技术学科的几个研究所划归国防科委管辖，有部队编号）工作，我们家和贺龙的事我清楚，我和你们谈！”我的出现，出乎“眼镜”的意料，原以为只有我母亲在家的情报有误，在我的呵斥下，“眼镜”急忙拽着那位还想辩解的街道办事处人员退出了我们家，落荒而去。不一会儿，那位街道上的人又来敲门，语调也缓和了：“人家是广东一个什么大学来的外调，有介绍信，被外调的人是你妈，不能代替，请协助到办事处去一趟。”我脾气又要发作，被母亲下床拦下：“算啦，少说一句吧，我去。和薛明的关系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去。”等母亲回来，听说那个“眼镜”又吓唬我母亲，什么

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之类词，我听了既好气又好笑，生气的是面对一个柔弱的老太太你发什么淫威！可笑的是难道世上有良知的人都会像你“眼镜”一样，被吓唬两句就昧着良心瞎说吗？想来，那个“眼镜”外调一遭，也没有挖出什么对他们有用的材料，不免恼羞成怒。听说为此还召开了对二姐的批斗会，但批斗的内容却是声讨“眼镜”在北京遭遇的xxx部队愣小子的“嚣张气焰”，这大概是“眼镜”在北京受了窝脖子气，只能向被他们“专政”的对象撒了。如果“眼镜”们还活着，请扪心自问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非颠倒、无法无天的所作所为是道德之举吗？请回归“人之初，性本善”的良知吧。

4 生离死别

1992年初春，从广州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我二姐在手术时发现已罹患肝胆管癌症晚期，只能对症保守治疗。听到噩耗，我立即决定代表在京的大姐（身体不佳，已住在老年公寓）去穗探望和抚慰饱经坎坷风霜的二姐。二姐在新中国成立前，把她的青春献给了为打败国民党旧势力、迎接新中国诞生的伟大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前，她为了当好双肩挑的基层干部，兢兢业业、不惜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经受了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而没有屈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在落实干部政策中虽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她忍辱负重、无怨无悔地参加到了恢复高考后教研室百废待兴的重建工作。在家庭，她还要为“文化大革命”中因去干校而10岁出头就无人管的一双儿女的工作和学习而操心奔走。在80年代，她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为了获得好的教学效果，她不停地查资料、通宵达旦地赶讲稿等。这一切，从精神和身体上摧残了我二姐，她罹患不治之症就是必然的了。

我这次去看望二姐，谎称是赴穗开会（其实是请假自费）顺道来探望的，以免让她感到有临终探望之嫌。在广州机场，从二姐夫老张那里，已知二姐因化疗低烧进食较困难，采用保守治疗法以抗生素和营养液来延续生命。为了早点见到二姐和尽可能保持带给二姐家乡小吃的鲜味，我下飞机后直奔二姐所住的中山医学院。到达三楼病房，躺在病床上的二姐，意外地看到了我和带来的那些广州少见的家乡小吃，二姐分外高兴。只见她一边兴奋地问着我北京大姐身体如何、弟妹德馨当上学部委员后是不是更忙了以及侄子小璐和侄女小珈的学习现况如何，等等；同时津津有味地吃着带来的芝麻烧饼夹酱牛肉。这令我百感交集，在病重之际的二姐，仍一如既往地惦记着她的亲人，而唯独没想到自己。同时，见到我带给她的家乡小吃居然能唤起了她的食欲，使我多少有一丝欣慰。现在，联想起我最近患流感发烧期间，吃东西味同嚼蜡，难道当时病重的二姐会有食欲吗？也许她是为了让让我宽心、高兴，特意做出来的。想来，这就是她一生总为别人着想的又一写照吧。

和二姐相处几天之后，终于到了和她告别的时候了。在去病房的路上，我想起了1976年秋的一幕，当时“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二姐要从探视罹患绝症的母亲身边返回广州参加中山大学百废待兴的教学工作。记得二姐在和母亲互道珍重告别之后，照例是由我送二姐去北京火车站。当我们一出百万庄家的大门，二姐的泪水就夺眶而出，她哽咽着说恐怕她这一走就是要和妈生离死别了，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现在，我也要和二姐告别了，这何尝不是生离死别呢？在病房，我连连嘱咐二姐要注意保重，等等，二姐频频点头。未了，二姐突然冒出一句“你看我这个病还能好吗？”我心中一颤，感到二姐求生愿望是多么强烈！事实上，在当时正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二姐面前会有多少事情在等着她去完成，在她和老张终于分到了新的住房要等着他们去设计装修，在已成家的孩子们面前他们还要做多少事来维系这个大家庭的和谐？总之，在历经坎坷，终于见到了光明时，她多么想和家人来共享？面对着二姐的期待目光，我急忙说：“当然，只要和大夫好好配合，你一定会康复的，你要安心养病，等身体条件允许了，我接你去北京住一段。”也许这是我当时唯一能说的宽慰话了。当我随着外甥张跃（准备送我去火车站）离开病房时，二姐还一再叮嘱小能（张跃乳名）一定要找个地方带我去尝一尝广东的早茶，这不仅使我想起了几十年前二姐和大姐带我去西四吃豆腐脑的情景。我的耳边又回荡起那位卖豆腐脑掌柜的箴言：“长大了可不要忘了（你姐姐）她们哟！”当我迈出医院大门，压抑的感情闸门终于冲开了，我大哭起来，宣泄着我和二姐生离死别的悲痛，愧疚我无能让二姐回天和“弟欲养而姐不待”的无奈。

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透过车窗我远眺着巍峨的群山和无边的森林，心中默默地期待着人类能快一点找出战胜癌症的办法，企盼着人类再也不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让千千万万像我二姐这样清纯善良的人们不再遭受身心的无辜折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让人人都能无私地献出自己的爱，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二姐逝世十周年祭
写于北京新科祥园

王垿

2013.3月

同事朋友学生回忆文章

